

普林斯顿大学王阳明国际会议

李焕然 (Harvey Lederman)

作者简介: 李焕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

2022年3月, 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一次关于王阳明及其对明朝思想影响的国际跨学科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12位演讲者, 多达60位的现场参会者和30位在线参会者。据我们所知, 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第一次举办专门针对中国思想的会议。

《国际儒学(中英文)》慷慨地要求我作为会议的共同组织者, 写一份关于这次活动的简短报告。我想在谈到会议本身之前, 先介绍一下美国哲学系研究王阳明的背景, 以及我个人研究王阳明的路线, 可能会有帮助。

许多英美哲学系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以当代哲学中的问题为中心的。但几乎每一个系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教员仍然专注于哲学史。广义上说, 几乎所有的哲学史研究工作都是关于欧洲哲学史的。有一些系的教员研究印度哲学、非洲哲学、阿拉伯哲学或中国哲学, 但这些人相对来说是很少的。2017年, 当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受聘时, 我相信我是该系第一位对中国哲学有深厚研究兴趣的正式教员。

就那些在哲学系工作的学者对中国思想的研究而言, 他们大部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工作都集中在古典先秦思想上。最近, 人们对宋明儒学的兴趣开始明显增加。但是,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学者们对王阳明的兴趣出现了明显而重要的激增(主要是在东亚研究和相关领域), 而且从那时起就零星地出现关于王明阳思想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哲学家的作品), 但对王明阳的思想细节的兴趣并没有像如孟子所吸引的那样持续。^① 但是今天有一个相当大的学者群体在研究明代哲学, 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中有着相当不同的方法。本次会议的目标是将其中一些近年来做了大量真正出色工作的学者聚集在一起, 将他们彼此联系起来, 并开始在他们和一些用中文写作的学者之间建立一个连接网络。

由于一个在英语学术背景下的哲学家研究王阳明还是有点不寻常的, 我希望可以容我分享一些我对这个主题的个人路线。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 我主修古典文学, 主要是研究古典希腊诗歌。当时, 我对比较文学感兴趣, 想研究希腊古典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在普林斯顿, 古典汉语的课程是以现代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因此, 我在开始学习古典汉语之前, 先学习了一系列现代汉语课程。在即将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 我跟随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学习了关于《诗经》的研究生课程, 并且学习了关于《文选》的研究生课程。毕业后的那个夏天——

① 关于王阳明在欧洲和美洲的研究历史的重要作品, 见Israel 2022。

感谢克恩教授的慷慨支持,我得以在上海待了两个月,跟随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陈引驰教授学习。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也从当时其他很多和我慷慨交流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书评的盛韵和复旦中文系许蔚教授)。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但我越来越偏离文学而转向哲学。我参加了胡司德(Roel Sterckx)教授开设的课程,但也很幸运能够定期与那些既写过希腊哲学又写过中国哲学的学者交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爵士和罗伯特·沃迪(Robert Wardy)。尤其是杰弗里爵士,给了我许多指导我阅读的建议,而我当时也广泛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

随着我的兴趣转向希腊哲学,我也开始对当代的哲学问题感兴趣。在剑桥大学学习两年后,我转到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在牛津,我遇到了一些对中国和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学者——我曾一度认真考虑和麦迪(Dirk Meyer)教授一起撰写关于冯友兰哲学的硕士论文——但我主要是在一位老朋友,欧内斯特·布鲁斯特(Ernest Brewster)的帮助下继续学习中文。我向当时还是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布鲁斯特建议,如果有一个定期的中文文学阅读小组,对我来说会很有帮助。布鲁斯特推荐给了我他当时感兴趣的王畿和聂豹的文集。

我一直对宋明“新儒家”,特别是理和气的形而上学感兴趣,但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思想家。与欧内斯特一起阅读《致知议辩》迫使我比以前更深入地阅读。我必须承认,起初,阅读这些文章对我来说似乎只是一种有趣的爱好,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研究兴趣。但经过几年的定期会面后,有些东西让我心动了。当时是我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但我在纽约大学访问了一个学期。我坐在纽约大学图书馆的第十层(那里是图书馆中风景最好的地方,也是存放许多中国书籍的地方),重读我以前读过的王阳明的部分。突然间,“知行合一”让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以前没有的。它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刻的理论跃然纸上,但另一方面,显然是错误和令人困惑的。当然,这种经历并不像王阳明在贵阳的一个山洞里进行领悟那样具有戏剧性(我当时在一个环境良好的图书馆里,里面还有很多书),但我当时的紧张感,激发了一种真正的兴奋感和理解王阳明思想的真正愿望。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自己努力工作,调查王阳明思想的背景。最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哲学研讨会上做了关于王阳明的第一次演讲。安靖如(Stephen Angle)教授亲切地对这次演讲进行了评论。安靖如教授的评论深刻地影响了我在那个阶段的思想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是在匹兹堡,然后在普林斯顿,我继续研究这些最初的想法。最终,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田史丹(Justin Tiwald)教授。大约一年后,他对我论文的草稿给予了宝贵的反馈。田史丹教授让我与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教授取得联系,他们一起阅读了我关于王阳明的许多草稿。田史丹教授和艾文贺教授对我的慷慨程度让我怎么感激都不为过。他们基本上充当了我的第二个博士生导师。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报酬,只是出于对一个当时他们没有什么理由相信的人的善意。许多像他们一样忙碌而有成就的人都会直接忽略我的电子邮件。但他们是学术界慷慨的典范。

我也很幸运,在我以教员身份返回普林斯顿后,从这里的学者和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参加了威拉德·彼得森(Willard Peterson)教授的研讨会,与田安(Anna Shields)教授进行了几次重要的对话,还与居住在普林斯顿的研究中国佛教的杰出学者艾静文(Jennifer Eichman)进行了对话。2020年,我得以教授一门关于宋明理学的课程,那门课上的学生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这个更大的集体最终帮助支持我完成了关于王阳明的几篇论文 (Lederman 2022a, Lederman2022b, Lederman forthcoming)。这个系列的主要论文现在已经出现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上,它的发表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本杂志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首要哲学杂志。在它出版之前,该杂志上最后一篇关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文章是冯友兰在 1948 年的一篇文章(冯友兰 1948)。

当这些文章开始发表时,艾文贺教授在他和我继续讨论王阳明时向我建议,我们可以一起举办一个会议,以巩固对这些思想的兴趣,并将一系列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我们问曾参加过我的新儒学研讨会,并对我关于王阳明的思考有所贡献的张雪音(Snow Zhang)博士(纽约大学/伯克利大学)是否愿意共同组织这次会议,她欣然答应了。

在普林斯顿举行会议的一个原因是,该大学在历史上不仅是更广泛的中国思想史的中心,也尤其是明朝思想研究的中心。东亚研究系是由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创立的,他对明朝有广泛的研究。余英时、韩书瑞(Susan Naquin)、本杰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和威拉德·彼得森等教授,都对我们对这段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会议的一次休息中,彼得森教授向与会者提供了一张地图,以便他们能够参观余英时教授的坟墓,一些与会者参加了这次“朝圣。”

艾文贺教授、张博士和我在 2021 年夏天开始策划这次会议(会议的最终网站可以在 wangyangmingprinceton.edu 上找到,那里还有详细的讲座说明、与会者名单和一些照片)。当时,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是否允许到普林斯顿国际旅行仍不清楚。鉴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不得不限制国际演讲者的数量(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演讲者)。有许多杰出的客人,我们本想把他们带到普林斯顿,但遗憾的是,由于时差和旅行限制,我们无法邀请他们(哪怕是在线上)。

在哲学系主任吉迪恩·卢森(Gideon Rosen)教授,以及尤其是东亚研究系主任田安教授的指导下,我们能够从普林斯顿的各个地方筹集到慷慨的资金。除了哲学和东亚研究之外,大学人类价值中心(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Human Values)、人文委员会(the Humanities Council)、文化、社会和宗教中心(the Center for Culture, Society and Religion)、当代中国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和东亚研究项目(the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都支持这一活动。他们的慷慨解囊使我们有可能不仅为会议上的发言者,而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与会者支付旅费。由于会议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建立一个社区团体,我们认为把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带到普林斯顿是我们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看到这么多来自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人就这些强大的思想和中国历史上这个迷人的时期进行交流,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3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发言人在普林斯顿葛斯德图书馆中由何义壮(Martin Heijdra)管理的珍本图书室进行了一次会议。他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明朝的作品(不幸的是,一份由王阳明本人书写的手卷,也是本次会议网站的背景,在普林斯顿博物馆建设期间被存放了起来,所以我们无法看到它)。

这场会议之后,有两个中文讲座:一个是来自中国台湾中研院的林月惠教授,另一个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吴震教授。

林教授经过长途跋涉,亲自来到会。在大流行病的艰苦条件下,这段旅程对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意义重大,大家被她的善良、她的活力和她的学识所感动。她介绍了她早期的一篇文章(林月慧 2015),对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的重要著作《人生第一等事》(Kern 2010)进行了批评性评论。由于这本书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虽然有中文译本),它没有对用英语写作的学者产生应有的影响。林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她总结了其中的一些主要结论,但也指出了她对他论点的怀疑之处。例如,她反对他关于罗洪先与王畿更相似而非聂豹的说法,重申了罗洪先与聂豹更相似的传统观点。除了她在讲座中的博学贡献外,提问环节也是清晰和高参与度的典范。对许多听众来说,她的讲座是对王阳明追随者的丰富思想的启发,并让他们意识到这些文本的哲学内涵是多么丰富。

在观景宫吃完晚餐后,与会者回到会场,听取了吴震教授的演讲。他从上海连线发表了他的演讲。我们非常感谢吴教授在上海的一个周六早上早早起床来做这个演讲。他讨论了他最近关于知行合一的论文,特别是“一念动处便是知亦是行”(吴震 2018)的说法。他的论文为这一经常被研究的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提出了与王畿对“一念”的使用的一些联系,在那里它显然是一个专业术语。吴教授认为,知行合一主要是一种关于培养良知的适当状态的学说,而不是一种关于特定形式的知识的学说,正如该术语在认识论中被理解的那样。

在周六和周日,我们总共有十个演讲,都是英文的。虽然这些演讲都是围绕着王阳明和明代思想展开的,但它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彼得森教授对我说,他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自助餐”,有不同口味的菜肴,对应于不同学者对这一时期和这些思想采取的不同方法。虽然这使会议(在我看来)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智力体验,但它也使人很难将这些会谈总结成一个连贯的叙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建议读者在会议网站上查看详细的总结,而在这里只做最简单的讨论。

周六上午,田史丹(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香港大学)发表了一篇关于“诚”在王阳明思想中作用的论文,他认为(以一种与陈来教授的重要工作相一致的方式(陈来 1991),尽管超脱了它之外),王阳明并不认为立诚是一个人成为完全有德行的唯一步骤,而只是认为它是这样做的最困难的步骤。

韩若愚(Rivi Handler-Spitz)(美国马卡莱斯特学院)随后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关于哲学作品的文学问题上。在她的论文中,她研究了语录体裁以及相关的对话是如何影响晚明哲学写作的生产与消费和内容的。

在韩若愚教授的演讲之后,刘纪璐(JeeLoo Liu)教授(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谈到了对王阳明“心即理”学说的理解。她反对对这一学说进行理想主义的解释,但也反对更简约的、现实主义的解释。相反,她认为某种实用主义,在皮尔斯特罗姆(Pihlström)的研究的启发下,可以为解释这一学说提供适当的视角。

我在下午就我的论文《王阳明的真知自省模式》(The Introspective Model of Genuine Knowledge in Wang Yangming)做了发言,我在上面提到过。这篇论文在我对《大学问》中一个关键段落的解释的基础上,对王阳明中的真知概念进行了辩护。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高层次的知识形式与诚意的实现之间的关系。

在我的演讲之后,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哈佛大学)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新书《本地化学习》(Localizing Learning)(Bol 2022)中的一章,描述了心学在浙江金华县的传入如何在当地引起争论,同时也重振了当地的学术机构。彼得森教授是包弼德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他能主持这次会议

是很有意义的。

忙碌了一天后,我们在格林总理圆形大厅(the Chancellor Green Rotunda)的大型会议晚宴上放松了下来。

李蕾(Leigh Jenco)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周日的会议上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晚明对文学微妙而复杂的态度的故事。她描述了这一时期的一些学者如何开始认为纯粹的情感表达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并开始在非精英文学中寻求这些表达。这一转变不仅给这些非精英文学带来了新的合法性和意义,也为新形式的学术事业创造了背景:耐人寻味的是,向内转向心学导致了向外转向收集非精英文学。

彭国祥教授(浙江大学)曾是乔治敦大学的访问学者,因此能够亲自参加会议,然后为我们进行了一个受已故的余英时教授的工作启发带来的讲座。他区分了新儒家对政治变革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得君行道,另一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觉民行道。他描述了明朝的思想家是如何应对明朝皇帝的专制统治,放弃前一种方法而转向后一种方法的。他的论文最后评估了这种转向的价值,因为当时的许多学者对他们无法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而感到很沮丧。

接下来,艾静文让我们进入了宗教研究领域。在她的演讲中,她向我们介绍了她对王畿作品的丰富的新译本,特别是关注王畿对“不二”概念的理解和转变。讲座详细展示了王畿对良知的理解的发展(以及他对其思想的修辞表述),包括以高度复杂的方式对道教和佛教文本进行创造性和富有成效的重新利用。

会议的最后两场讲座,由安靖如教授(维思大学)和艾文贺教授(乔治敦大学)提出对我工作的批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非常感谢安靖如教授和艾文贺教授的指导,他们继续慷慨解囊,对我的解释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修正。安靖如教授提出了一些反对自省模式的论据,并提出了他所谓的情感模式,即真正的知识是由对周围环境的情感反应构成的。艾文贺教授对我的方法论提出了一些更广泛的批评,以王明阳的形而上学应该被认为是与知行合一有关的方式为重点,并且对我对王明阳文字的解读提出了几个问题。

如果没有吉迪恩·卢森教授,以及尤其是田安教授的指导,这次会议是不可能的举办。我的共同组织者艾文贺教授和张博士也对活动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许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哲学系的凯萨·克雷格(Keisha Craig),以一种天衣无缝的方式,以独特的热情和好客的态度,帮助组织膳食和活动场所。我感谢他们所有人。

我不是一个最客观的观察者,但我相信会议整体上是成功的。我自己从演讲者丰富的演讲中,以及从我们能够围绕这些演讲进行的对话中,学到了很多。也许我印象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支持出席的年轻学者们彼此联系,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

我希望这次活动将是更丰富的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希望看到进行东亚研究的学者们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系。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当面交谈和研讨。我相信,一起学习和研讨将丰富我们对这些文本的集体观点。这些文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地位,还在于它们对我们理解人类在社会和整个宇宙中的地位的贡献。

致谢:感谢张雪音、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田史丹(Justin Tiwald)的建议,感谢袁艾的盛情邀请,感谢李晔子的翻译。

参考文献:

- [1]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2] Peter Bol, 2022, *Localizing Learn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3] Fung Yu-Lan, 1948,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 Future World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7, no. 6, 1948, pp. 539–49.
- [4] George L. Israel, 2022, *Studying Wang Yangming: History of a Sinological Field*,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
- [5] Kern, Iso (耿宁), 2010, *Das Wichtigste im Leben: Wang Yangming (1427–1529) und seine Nachfolger über die “Verwirklichung des ursprünglichen Wissen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Wang Yangming [1472–1529] and His Successors on the “Realization of Original Knowledge”), Basel: Schwabe. Translated as 《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by Ni Liangkang (倪梁康), 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16.
- [6] Harvey Lederman, 2022a, “The Introspective Model of Genuine Knowledge in Wang Yangming”,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31. 2: 169–213.
- [7] Harvey Lederman, 2022b, “What is the ‘Unity’ i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Dao*, 21(4).
- [8] Harvey Lederman, Forthcoming, “Conceptions of Genuine Knowledge in Wang Yangming”, *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
- [9] 林月惠,《耿寧對陽明後學的詮釋與評價》,《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3期,2015年5月,第7—23页。
- [10] 吴震,《作为良知伦理学的“知行合一”论以“一念动处便是知亦是行”为中心》,《学术月刊》,2018年,第14—24页。

(译者:李眸子;责任编辑:袁艾)